

【上编】

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

李维军敬题



吾視少陵詩謂占元氣偉力能抗

天幹天地壯顏毅毫不可求浩蕩八

極內生物豈不稠醲所巨細千萬殊

竟莫見以何雕刻時一命之窮顛倒

走才九州瘦

蘇東坡吟

蕭先乾 整理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

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

【上编】

李涪军敬题

PDF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/萧光乾整理. —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5316-4083-X

I. 萧... II. 萧... III. ①杜诗-文学研究②杜甫(712~770)-人物研究 IV. ①I207.22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721 号

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

XIAO DIFEI DUFU YANJIU QUANJI

(上、下编)

萧光乾 整理

策 划	李寅奎 黄树峰 李曙光 于文杰 丁一平 梁 昌
责任编辑	王爱琳 刘剑刚
技术编辑	王秀艳
整体设计	傅 旭
责任校对	耿 喜 郝庆多
出 版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发 行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印 刷	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57
字 数	810 千
出版日期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316-4083-X/I·148
定 价	118.00 元(上、下编)

吾觀少陵詩謂子元氣偉力能抗

天幹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

極內生物豈不稠醜折巨細各殊

元氣見以何剛鍛情壯

不見收青形老更斥賦

要後前王什後懷、流

戰舊此時不廢朝廷抗幸歷天子聖

文臣各伊周寧今吾唐將破受凍死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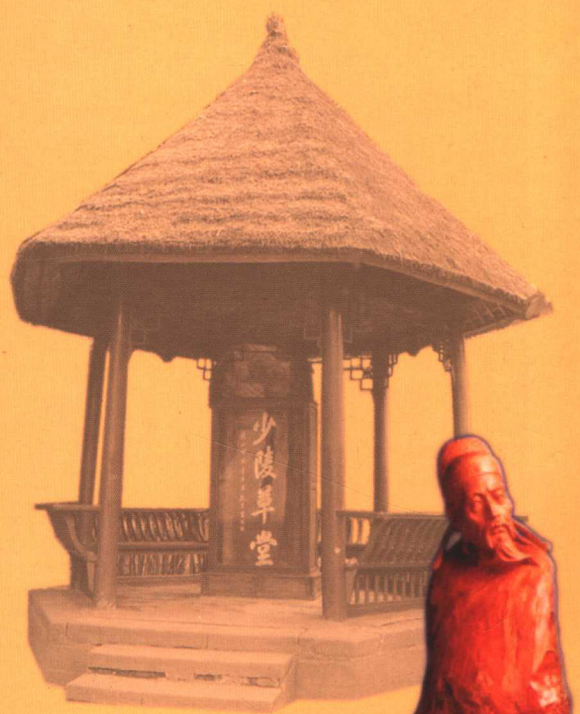
思四海赤子心健、傷七悼失止一身



我经常怀着这样一种心愿，就是：把诗人杜甫和他的诗，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，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诗。

萧涤非

1955年11月15日





泗水推公之心亦少歷楚公死後

之游

此王荆公至道重懷語也而公一生之志

業亦即此可見人原有理想古今同然 錄原

鹽州王安石研究會

蕭濂非



丙午年夏于濟南



注」等。

萧涤非先生(1906—1991)，我国著名文学史家，新中国杜甫研究的主要开拓者，人称『20世纪的杜甫』。江西临川湖南乡人。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，师从学者黄节。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、四川大学、西南联大等校。1936年与爱国将领李烈钧外甥女黄兼芬结婚。1941年重返山东大学，执教山大11载。曾兼任山东大学副教授、中文系主任等职。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国务院古籍小组顾问等，是新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。著有『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』『萧涤非说乐府』『杜甫研究』『杜甫诗选』等。

萧光乾 整理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

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

——代前言

一

我的老师黄节先生有句诗：“壮年怕题生日诗。”他为什么“怕题”呢？大概是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“题”的。这自然是老先生的谦词，实际上他是不愿题，不愿为人所知。他自号晦闻，也正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学我老师的，他尚且如此，所以我更是不愿提自己的事。几个刊物约我写什么自传，谈什么治学经验，我最怕这个，至今没有动笔，还欠着账，人家可能会有意见的。你们几次要访问我，坚持要我谈谈，实在推不掉，只好谈一谈。

我为什么“特爱少陵诗”呢？这和我的身世有关。我未满周岁就失去了母亲，10岁时又失去了父亲，是一个孤儿。我的童年是在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度过的，亲眼看到了农民的疾苦。儿时读《水浒》，印象最深的就是“智取生辰纲”中白日鼠白胜唱的那支民歌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背得最熟的不是那些五言绝句，而是杜甫的长诗《兵车行》。

当时虽不知杜甫为何许人，但杜甫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以后，我又通读了杜甫的全集。那时黄节先生开了六门课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《诗经》和





《汉魏乐府风笈》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《历代风诗选》，从《诗经》一直选到清末黄遵宪，就是在他的这种影响下搞出来的。这实际上是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，通过这番调查，使我看到在中国古典诗人中，反映民生疾苦的，要算杜甫最为突出。杜不仅作品多，而且感情最真挚，思想最深刻。但这时在感情上，我和杜甫还没有发生共鸣，对杜诗也还谈不上特别爱好。

1930年我大学毕业。但在旧中国，毕业就是失业，找不到生活出路。因为在清华时我还是个足球运动员，小有名气，所以当时曾有一位好心的同学介绍我去河南当体操教员。我觉得一个学中文的却去吃体育饭，不好意思，就谢绝了。恰好这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，规定大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可以免试，每月有30元的津贴，这样我进了研究院。导师就是黄节先生。毕业论文就是后来出版的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，黄先生以为“切实”“确当”“皆特见也”“宜置超等”。清华同学会还半开玩笑地送我一个刻有“状元”二字的铜墨盒。可是，我研究院毕业后，依然面临着失业。最后，还是靠黄节先生的力荐，才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因为当时山大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学生，黄先生对他甚至说了“如不接受，就断绝师生关系，以后也不要来见我”这样严肃的话。

我真正爱上杜诗，并从感情上发生共鸣，是从抗战前后开始的。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经历，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情形有点相似，“战伐乾坤破”，“天地日流血”，亲身尝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。抗战前期，在四川大学任教，当时的川大校长是国民党CC分子程天放，他手下的一帮人胡作非为，大家都骂他们是“党棍子”，因我是外乡人，程就先拿我开刀。按照当时惯例，若解聘教员，必须在一个月前通知本人，而程却直到最后那天才通知我，搞突然袭击，使人措手不及。我当然很气愤，但也没有办法。

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幸亏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我去，名义是副教授，闻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。这样我就到了昆明。在昆明的5年，生活特别艰苦。昆明的物价，当时号称“世界屋脊”。我虽为教授，却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不得不到其他





大学、中学甚至小学去兼课，有时还不免饿肚子，进当铺。使我特别伤心的，还是我亲身尝到了一种变相的卖儿鬻女的痛苦。当时我已有两个男孩，爱人又怀了孕，因为经济困窘，感到实难养活，经友人说合，决计出生后就送人。这是我作为父亲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一天深夜，仰屋卧床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写了一首《早断》诗。这首诗，朱自清先生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《饮河》诗刊上。有读者致函诗社，说诗写得“沉痛真挚，读之泪下”。后来爱人因劳累过度而早产，婴儿三日而夭，是个女孩。

当然不仅生活上异常艰苦，政治上也备受压抑。我那时住在昆明附近呈贡县的一个村子里（卞之琳、沈从文也住在那里），就亲眼看见国民党拉伕，把人用绳子连成一串串的，以防逃跑；有的生了重病，人还没断气，就被扔到后山上，乌鸦啄他时，手还在挥动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，还有许多。特别是1945年12月1日，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打和残杀爱国师生，其中就有我的学生潘琰烈士。她因为救护受伤同学被手榴弹炸伤，手指被弹片削掉，倒地后，胸部又被国民党特务猛戳三刀，当日下午在云大医院与世长辞。同时被害的共四人。我真是怒不可遏，写了《哭潘琰君》诗两首，开头两句是：“堂堂黄字变屠官，血染青天白日红。”诗被学生拿去发表在《妇女》旬刊专号上，让一个国民党同事发现了，半夜找上门来提出警告，说是侮辱“党国”，要我当心点。我说：“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青天白日之下杀人，我并没有造谣。”

所以，是生活使我接近了杜甫，产生了研究杜甫的念头。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读杜甫的诗确是一种安慰。就像文天祥在狱中说的那样，你想说的，老杜已先代你说了，读他的诗，就像自己的诗一样，而忘其为老杜诗了。我总觉得，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杜甫是欠劳动人民的血汗债最少，而又为劳动人民说话最多的诗人。因此对杨亿之流骂杜甫为“村夫子”特别反感。宋人戴禺就曾不服气地说：“少陵甘作村夫子，不害光芒万丈长！”这驳斥得很痛快。杜甫是“嫉恶信如仇”的，他说：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。”这种爱憎分明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陈老总对这两句诗评价极高，说是“最富现实意义，余





以千古诗人、诗人千古赞之”。杜甫是可以当之无愧的。

总之，我的生活实践和个人经历，使我逐步爱上了杜甫，爱上了杜诗，所以当抗战胜利后，1947年我又回山东大学的第二年，便开了杜诗这门课。但这也只是一个开端。

二

在治杜过程中，我师承了黄先生的哪些治学经验？我与黄节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，一点不假，他是我的恩师。他治学的一个特点是取材宏博而又取舍谨严，这对我很有教育作用。他研究任何问题，都是首先尽可能地占有有关材料，如研究某个作家，就尽量把前人的有关著作都收集到。

黄先生是1935年正月病逝的，由我和他的女婿清理遗书，其中有关《诗经》的书籍竟不下数百种之多，但他写的《诗旨纂辞》（未完成）却非常简要。他注解过曹子建、阮籍、鲍照、谢灵运诸家的诗和汉魏乐府，对阮籍诗下的工夫尤深。他结合作者生平、时代背景，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，毫不穿凿附会，对阮籍的一些看法和鲁迅先生是不谋而合的。

黄先生在教学上也极为认真。记得他开过一门选修课，选这门课的只有两个人，有时一人请假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听，但黄先生在讲台上照样讲，依然声如洪钟，以至隔壁教室都能听见。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确实感人。我讲一件小事。平日我去看黄先生，他总是彬彬有礼，穿着长袍下楼接见我。但有一次，是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我去看他，他却破例让我上楼去。我一进门，只见他满头大汗，正在翻书，我问他干什么？他说曹子建诗里有个典故还没查到，明天有课，我要准备。我说，曹子建的诗你在北大、清华都讲过几遍了，一个典故查不到关系不大，明天照样可以讲嘛，何必还这样费力备课。他注视着我说，不行！上课前我总要备课，我得查出来。他这种认真态度对我后来的教学影响也是很大的。

说到杜诗，我认为杜诗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：一是“大”。这“大”又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内容的广阔性，杜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





个方面,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,如绘画、舞蹈、书法、音乐等。一部杜诗,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,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,所以向有“诗史”之称,由于他还写了许多纪行诗,所以宋人又有“少陵诗卷是图经”的说法。一是形式的多样性,各种诗体无所不包,古体诗,近体诗,包括律、绝直到很少用的长篇排律,杜甫都写过,所以陈老总说:“吾读杜甫诗,喜其体裁备。”杜甫以诗代史,以诗寓褒贬,以诗写人物传记,写传奇,写奏议,以诗写赠序,写书札,写自传,写游记,在杜甫手中,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。所以前人说杜甫“无一事一意不可以入诗”,是符合实际的。杜诗的第二个特点是“真”。杜甫感情真挚,毫不装腔作势,他的诗都是在一种“不吐不快”的状况下写出来的。所以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,读来格外感人。《庄子》有一段话说: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,强怒者虽严不威,强亲者虽笑不和。真悲无声而哀,真怒未发而威,真亲未笑而和,真在内者,神动于外,是所以贵真也。”这段话讲得很深刻。杜诗有真情实感,爱则真爱,恨则真恨,悲则真悲,乐则真乐,所以能动人。清人黄生说:“他人无所不假,杜公无所不真耳!人假,故其诗亦假;人真,故其诗亦真。”这话说得也有见地。

在研究杜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博与专的关系?我认为博与专的关系,是辩证的关系,二者是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,但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。一般是先从专入手,然后由专而博,以专带博。所谓专,就是对研究对象深入挖掘。在深入的过程中,自然会发现问题,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博。专要求博,专又推动博。研究杜诗,杜诗就是专的对象,要熟悉对象,要集中精力、聚精会神地深入研究。这样,博才不至于漫无边际,要专中求博,对象不熟,博则无从入手。杜诗号称“诗史”,号称“图经”,黄庭坚还说杜诗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所以自宋以来,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不行万里途,不读万卷书,不可读杜诗。”既然如此,研究杜诗,不博怎么行呢?研究杜诗的一字一句都要专,而要解一字之疑,释一句之难,也非博观不可。如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一诗,对剑器舞是不是舞剑,陈寅恪和任二北先生都有详细的考证,而二人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查阅了许多记载乐舞





的书籍和描写剑器舞的诗文,通过阅读唐人诗中有关剑的描写,发现唐人多以秋水、青蛇等比喻剑光,从而认为诗中“罢如江海凝清光”一句,也应当是以水色喻剑光的。由此而推知剑器舞必用剑,否则不可能有此境界。

因此,要作出一个判断,就必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。写起来是一条注,而实际工作却是很复杂、很艰苦的。这就需要博览,需要积累。所谓“取材宏博而取舍谨严”者,就是要广泛占有材料,将占有的材料加以比较,然后才能决定取舍,才能避免片面性。取材不宏博,仅仅根据一二条材料,谈得上什么取舍?所谓“博观约取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惟有“博观”,方能“约取”,惟有“博观”,取舍方能谨严。

三

关于方法问题。我不敢说什么治杜诗的方法。如果谈得上研究杜诗的话,那还是解放后的事情。主要是在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,特别是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和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之后,才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。毛主席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精辟论述,就指导着我去着重研究杜甫接近人民生活的一面。解放初期,因为怕犯形式主义的错误,对作品往往只谈思想性,不谈或少谈艺术性,结果,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,变成政治标准唯一,艺术标准第二,无形中被取消了。我觉得这并不符合毛主席《讲话》的精神。因为毛主席分明指出:“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,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,也是没有力量的。”正是基于这种体会,我在《杜甫研究》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杜诗的艺术性,并写了《杜诗的体裁》的专章。

鲁迅先生说过一段重要的话:“我以为倘要论文,最好是顾及全篇,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,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,这才较为确凿。要不然,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。”这段话,对文学研究者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,是鲁迅先生现身说法的经验之谈,和我们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,调查研究,全面观点,辩证观点等,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。毛主席说“说话要有根据”,没有根据就没有说服力,根据不足就缺乏说服力,但要做到说话有根据,也只有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行事。我自己就





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杜甫研究的。做学问切忌断章取义,以偏概全,更不应该只凭个人好恶而妄加抑扬。研究杜诗,不仅要懂得某字某句某篇,而且要了解杜甫的全人,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,不仅要翻阅杜甫的全集,而且要翻阅大量的有关历史资料。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博了。由全篇而及全人,而及所处的时代,不博怎么行呢?

至于注解杜诗的具体方法,我认为最好是“以杜解杜”。清人吴兴祚在《杜诗论文序》中说:“不强杜以从我,而举杜以还杜。”这对我们今天注解杜诗还是适用的。尤其是在有关杜甫为人的某些问题的争论上,特别值得我们记取,以免犯“强杜以从我”的毛病。如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“顾惟蝼蚁辈,但自求其穴”两句,有的注家认为是杜甫自谓,如浦起龙;有的人认为不是,如王嗣奭谓两句“骂庸臣刺骨”,杨伦认为是“指琐事干谒者”;近来也有人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,认为既不是指自私自利奔走干谒的人,也不是杜甫自指,而是杜甫的“自解和自嘲”。究竟哪种解释更切合杜诗原意呢?这就要结合全篇全人来理解。我是从杨伦的说的。因为“穷年忧黎元”是杜甫的中心思想,也是贯串全诗的骨干。因为“穷年忧黎元”,所以杜甫能够从“彤庭所分帛”而想到“本自寒女出”;能够从“朱门酒肉臭”联系到“路有冻死骨”;能够在自己“幼子饿已卒”的情况下而“默思失业徒,因念远戍卒”,以至“忧端齐终南,溷洞不可掇”。杜甫既然是“自比稷与契”的,怎么可能自比于“但自求其穴”的蝼蚁之辈呢?再就杜甫全人讲,也不可能。这是不必多说的了。不错,杜甫曾自比于“丧家狗”,但那是指由于经济困窘而出现的狼狈相,和人格无关,而“蝼蚁辈”则是贬斥人的话,是个思想问题,人格问题。很明显,《咏怀五百字》中的“蝼蚁辈”,就是指诗中的“同学翁”,居“廊庙”者流,和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诗中所说的“各有稻粱谋”的“随阳雁”正是一种货色。对《羌村三首》中的“娇儿不离膝,畏我复却去”,我认为也应该这样结合全篇和全人去理解。为这两句诗,我已写过三篇文章了。

所以研究杜诗一定要细心,要用心,真正做到像杜甫那样“细论文”,那样“苦用心”。近人迄今还没有全注杜诗的,一般选本选的杜诗是比较好理解的,而杜集中有些诗却是不好懂的,很难理解,这就要发





扬“啃骨头”的精神，不要避难就易，要知难而进，锲而不舍。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，我偏是不肯放过，总要开动脑筋，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，如关于杜甫是不是人民诗人，杜甫的忠君思想，杜甫之死，论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》确为杜甫绝笔等一系列问题。我觉得要理解杜诗，首先就要熟读杜诗，前人说的“读百遍，义自见”，有一定的道理。当然也离不开深思，所以前人又有“思之思之，鬼将告之”的说法。不下一番苦功夫，要真正理解杜诗是不可能的。

说到几十年来治杜诗的甘苦，我觉得，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，是无所谓甘苦的，都是甘，不以为苦。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。尽管工作很艰苦，但苦中有乐，苦尽甘来，苦也就是甘了。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种寝食俱废的傻劲。说来也有点怪，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。如王嗣奭、仇兆鳌等就都是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于杜诗的。王嗣奭说他二十岁读《新安吏》，到八十岁还在读，一天夜里忽于枕上得一新解，即视为莫大的快事。他在诗中也说“忆昔攻诗梦少陵”，可见其用力之勤，用功之深。

我个人也有这么一点体会。常常是因为思考杜诗中的某个问题而寝食不安，如偶有所得，就是半夜三更也要起来把它记录下来。一些诗句确是在读过若干遍之后才懂得的。比如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序中的“玉貌锦衣，况余白首”这两句，前人读不懂，有的说上下文不接气，有的还要改动原文。我开始也读不懂，经过反复阅读，仔细玩味，我渐渐懂了，认为这是杜甫“以诗为文”，“玉貌锦衣”是指当年的公孙大娘，但这个主语被他省略了，“况余白首”则是指现在的作者自己。两句是说那时我尚童稚，而公孙大娘已是一个妙龄女郎，现在连我都白了头，公孙大娘就更不用提了。省去公孙大娘这个主语，文句更紧凑，对比更鲜明，更富有诗味，充满今昔之感，寄寓无限感慨。这样理解才切合这首诗“感时抚事”的主旨。

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曾引用宋词来比喻做学问的三种境界：第一种境界为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这是博览群书，确定研究方向的阶段。而当研究方向确定之后，就要真心实意地热爱它，倾注全力地深入钻研，这就是第二种境界：“衣带渐宽终





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搞学问,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不行的。而当你下了苦功,对所研究的对象透彻理解、真正把握之后,就会有所发现,有所创造,取得学术上的成就,这就是第三种境界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、灯火阑珊处。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第二种境界,我认为对每个搞学问的人来说,没有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那种忘我的乐观精神,是不可能作出什么成就的。在这方面,王国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身体力行者。他学贯东西,名垂中外,却是瘦骨嶙峋,古貌清癯。

四

如何做好《杜甫全集校注》工作?我们现在搞的是一个新的集大成的工作,实非易事。我们要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,丝毫马虎不得,懈怠不得。要做好全集校注工作,我看现在至少要有两条:一是物力,要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和占有资料,这是物质基础,是做好校注工作的第一步。资料不全,还谈得上什么集大成?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,花了不少精力。现在看来,重要的资料基本上都有了,但还要继续做下去,不断补充新的资料。二是人力,也就是工作水平问题,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。为此,我经常提醒参加校注的同志要下苦功夫,要打牢基础,要熟读杜诗,博览与杜诗有关的书籍,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。我愿与大家共勉。只有工作水平高了,校注的质量才能提高,才能超过前人。不然的话,要超过仇兆鳌那真是谈何容易!尽管我们现在的条件,要比仇兆鳌那时好得多。这里绝对需要的是谦虚和勤奋!

谈到打基础,我举一个事例。杜甫晚年,飘泊湖南,以舟为家,来往途中,有时因为阻风不得不把船停下,所以在《咏怀二首》之二中有这样两句:“拥滞僮仆慵,稽留篙师怒。”这两句并不难懂,“稽留”也是个普通词儿,和上句的“拥滞”一对照,意思更易明白。但最近有同志撰文和我讨论到这两句诗时,竟然把“稽留”这个词儿割裂开来,说“稽”是杜甫在夔州时雇的一名女婢“阿稽”,“留”是“留雇”,被杜甫由夔州留雇到湖南,这样就引起了篙师的不高兴。这是不应有的误解,





但也值得我们警惕。

杜甫晚年写过一首《南征》诗,其中有这样两句:“百年歌自苦,未见有知音!”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“知音”?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。这里又用得上杜甫早年的两句诗: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我们应当有这个气魄。我已经 75 岁了,不能不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同志们身上。同时,也切盼在较好地完成《杜甫全集校注》工作的过程中,能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。

(本文据 1981 年萧先生与杜甫组同志的谈话记录稿整理,见《文苑纵横谈》第 1 期张忠纲教授文。用代前言,编者加了这个题目。)

